

山东，有个文化故乡叫方言

□ 郝桂尧

除了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，语言文字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了。方言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“名片”，它储存了你所有的信息和秘密。

喜欢说“俺”的山东人，是一个最为迷恋方言的群体。山东话不浪漫，不抒情，不忧郁，没情调，缺点很多。在这个普通话流行的时代，为什么山东人那么迷恋山东话啊？

乡音不改鬓毛衰

方言在山东至今仍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。即使离开山东，到外地工作，山东人也仍然说着一口流利的家乡话。从大规模的闯关东开始，山东人把家乡话带到了东北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山东话传遍全中国。解放后，一大批山东籍的南下干部乡音未改。直到改革开放了几十年的今天，山东输送到各地的人才也还说着山东话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，是山东人最真实的写照。

每次出差去外地，只要一坐上回山东的飞机火车汽车，整个空间里就充斥着山东话，熟悉而又亲切。不管是否认识，大家都能聊得火热。方言，就是一片流动的山东土地了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有山东话伴随，我们就感觉脚踏山东的大地，心里就非常踏实、稳定，有一种依赖感。

让我们走进山东人的内心深处，看一看那奇特的心理世界。

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2000多年，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心理趋于超稳定状态，害怕变革与进步。齐鲁文化曾经深刻影响过中国，山东人为此骄傲，并表现出一种“守成”心理。

山东是中国农业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，至今山东仍然是农业大省，即使是山东城市居民，也大多遵循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农业社会生活方式，夜晚，老百姓的惟一娱乐就是看电视。

与农业文明相适应，孔老夫子的核心思想是“仁”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山东人喜欢稳定，循序渐进。

而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，就开始了剧烈的变化，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，山东人一方面要去适应社会发展，另一方面也要寻求精神的依靠与寄托，山东方言就成为山东人的精神寄托之一。它是山东人的心灵庇护所。

四大板块 南腔北调

一天，我突发奇想：如果我们还处在孔子时代，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是不是胶东人和鲁西人在一起交流也需要翻译？

因为山东各地的话有差异，所以就闹出一些笑话。网上就流行着这么一个故事：一个单位来了日本客人，到济南酒店订餐。单位秘书是胶东人，他把日本人说成是“一波银”，酒店听成是100人来就餐，觉得这是大生意，就把电话打回这个单位，问每个人是什么标准，没想到是办公室主任接的电话，他是淄博人，一听就急了：不是“一北人”，是“二本人”。他把日本人说成是200人了。

在我的感觉中，山东各地市的话都不相同，甚至一个县内的不同乡镇说话也不一样。方言学家钱曾怡、高文达等根据各地方言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方面的特点，把山东话分成两个大区：西区、东区；四个小区：西齐区、西鲁区、东潍区、东莱区。

我觉得惊奇的是，我们老家莱州的方言本来属于东潍小区，但是却又兼备东莱小区的特点，这在整个山东也是一个特例。

有专家从理论高度论述了保护方言的重要

性。在自然界里，有一个环环相扣的生物链条，每一个链条都不能缺少，否则会给人和地球带来灭顶之灾。这一链条在文化界同样存在。

专家说：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，普通话的很多词汇来源于方言，两者同属一脉，并不对立。方言的使用范围会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而逐渐缩小，保护方言是加强其在价值的研究整理，与推广普通话并行不悖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底通过的《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》中提出，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讲，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，每个人都有权用自己选择的语言，特别是用母语来表达思想，创作并传播作品。

山东话形成于龙山文化时期

语言是一种粘合剂，能够神奇地把一群人，一个部落凝聚起来。那么，山东话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？专家告诉我，是龙山文化时期，也就是距今4000——4600年前。

口语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传播媒介，其使用范围远远超过文字符号的运用。大约在200多万年前，人类在获得制造劳动工具能力的同时，产生了最初的语言。口语一直是人际间交流的最重要手段。

而作为一种方言产生的前提必须是定居。山东地区进入定居时代当属于龙山文化时期，这一时期已经进入文明的前夜，出现了城堡；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、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换和贸易已经具备了初步形态。同时，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，山东龙山文化就是东夷人创造的，最早的山东话就是东夷话。

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是黑陶。围绕着制作陶器，一个区域的方言逐步形成了。龙山文化区的语言就是龙山人的方言。这说明一个地域的文化不能离开方言而存在。

山东龙山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，东到黄海之滨，南至安徽和江苏北部，西到河南，北到河北等地。根据李荣等主编的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介绍，山东100多个县市的方言均属于官话大区，也叫北方方言，这是绝大部分中国人说的话。参考古代清声母入声字和次浊声母入声字在今天各地的分化规律，山东方言又分别划归三个不同的官话小区：冀鲁官话，中原官话，胶辽官话。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。其中包括山东青岛、烟台威海等40个县，大致相当于人们常说的“胶东方言”的范围。

其实不论是官话的3个小区，还是山东方言的四个小区，在考古学上都有对应的成果。龙山文化的类型跟现代山东方言分区有着惊人的相似。

济南地区所属的西齐片方言，属于冀鲁官话。以济南为中心的方言是山东方言的代表，跟民族共同语最为接近。西鲁片属于中原官话，这也是孔老夫子说过的话，它的声音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势。山东方言东潍片是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的分布地。

日照的两城镇遗址，是在上世纪30年代被发现并由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等发掘的。这一地区的方言属于汉语官话方言的胶辽官话，虽然跟东莱片具有共同的特点，但差别也是很明显的。从方言特点说，姚官庄类型的分布区潍坊、安丘等地代表了典型的东潍方言的特点，如有齿间音，“登东”不分等等；而两城镇类型的分布地日照、临沂则有从胶辽官话向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过渡的特点，其中日照方言跟诸城、五莲相近。

胶东话处于龙山文化杨家圈类型的分布区。东莱片方言区的人们偏居山东半岛东隅，与



内陆交往相对较少，其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，是汉语官话方言中胶辽官话的典型代表，在汉语方言中很受国内外方言学者的注意。胶东和辽东半岛隔海相望，山东人向东北移民的情况在历史上多有记载，胶东方言对辽东方言有重大影响，胶辽官话的形成就是胶东方向辽东地区延伸的结果。

语言不是一潭死水，方言之间也没有一条

界限分明的鸿沟。每一个语系，向内有交叉点，向外则有延接点。不同方言区人们之间要交往，也就避免不了方言间的相互渗透，也就是说，方言特点的过渡在地域上是渐变而不是突变的。

山东方言在交界地区存在着一些过渡性特点，比较典型的地区有临沂和聊城等，还有西齐片的济南、淄博跟东潍片同处山东腹地，两片人民之间交往较多，方言也有某些共同之处。

开放的山东话

语言因为有背后文化的支撑，具有相对稳定性，但是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人员的流动，语言也会发生变化。特别是代表强势文化的语言，会逐步蚕食、同化其他地区的方言。

作为一个古文明中心，山东自古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，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进入中原，给山东带来了新鲜的语言元素。从两汉开始，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，这一过程大概到宋朝完成，大量山东人南下，把北方话带到南方。而在元朝和明朝末年，由于战争山东人口大量减少，千里无人烟，政府大规模从山西、云南等地向山东移民，这些都使本地方言增加了外来词语，形成极强的语言包容性和融聚力。

济南有一句土话，“杠赛咪”，就是极其好、很帅的意思。有人考证，这个“赛”字来源于内蒙古古语。济南人还有句俗语叫“出洋咕儿咕儿”，也来源于蒙古族。成吉思汗时代，蒙古族贵妇人时兴头戴一种镶着红青锦绣和珠金的冠饰，这种冠饰蒙语为“kū kū”，汉语译音为：晋晋、姑姑、故故；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“俚语”载：“元人呼命妇所戴簪曰晋晋，盖虏语也。”其他元明诗文中对此也多有记载。这句话在官话中已经消亡，却在济南土语中保留了下来，而且词义也有了延伸。异于常人的举止、想法或麻烦都称作“咕儿咕儿”。

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，济南话也吸收了不少。满语词汇在济南话中就俯拾皆是——关饷(发工资)、磨蹭(拙钝、拖延)、邋遢(原意为“迟缓慢也”，现在意为不整洁、撒漫(四处看)等。

一位研究蓬莱土话的当地人，拿着东西“掂量话叫“掂子东西”；形容十分满，液体外溢，固体物已超出一定的限度，叫“浮撘浮撘满”；“昨天”叫“业(夜)里”。他琢磨发现，“掂子”和英语拿的发音“HAND、HOLD”相似；浮撘和英语满的发音“FULL”相似；业里和英语昨天的发音“YESTERDAY”相似。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历史原因？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：蓬莱地处沿海，历史上就比较开放，美国天主教堂很早就设在蓬莱设立。也许就是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，当地土话引进了一些外来词。

我走遍山东土话，发现各地都把昨天叫“夜来”或者“夜里”，这应该是一句本地话。山东话自己的特色至今仍然没有改变。山东话里有一个描写动貌的词语，叫“鼓涌”，表示蠕动的样子，动作幅度很小，可以用于人，也可以用于动物。这是一句只有山东人能听懂的话。好多外地学者都认为这是个土词，其实，这个词是个古词，是描写“虫行貌”的，在《集韵》中有两处可考。

现代山东话还保留着许多古汉语中的词汇和语音，如宋代的“夜来”，明代的“臧拉”、“倒达”、“仰摆”等等，这些话至今仍鲜活地活跃在山东人的口头。

毕竟，山东话在新的时代应该有一种新的力量。

尺书闲话

如果梁山泊是个企业

□ 张奉连

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，他们能不能进一步把事闹大？

我看不能，因为其人才机制已经走进死胡同。一百零八人上应星宿，排排坐定，不但堵死了外来者的晋身之路，也消灭了内部升降调整的激励机制。这要是是一个企业，死定了。

据《大宋宣和遗事》载，宋江一伙是让济州太守张叔夜剿灭的，也就是说让一个地区行署专员就给搞掂了，远没有小说写的那么狂。

为什么这么不经打？《遗事》里的一句话可以看出端倪：“宋江等三十六人纵横海滨。”显然，这是一个封闭的人才结构，缺乏扩张的动力和机制。

顺便说一句，三十六或一百零八，不但在中国古代，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一组相当神秘的数字，大有来头，完全可以做一篇论文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施耐庵可能觉得三十六人气魄不够大，又加上七十二地煞，凑成一百零八之数。但这仍是一个全封闭的系统，构成一个全封闭的利益集团，打江山肯定没戏，受招安已是最好的出路。

梁山泊在人才机制上一直没理顺。

三任领导，王伦是个个体户，比我能耐的体想进来；晁盖有点像家族企业的老板，过分维护老弟兄的利益，外来投奔者看着不顺眼的就嚷嚷着推出去砍了；宋江相当于某些国企领导，一朝权在手，把自己人在不同岗位上安排好，就一劳永逸准备大碗喝酒大秤分金了。

梁山泊人才机制的核心弱点，在于每个人都看不到个人发展的前景和希望，你来的时候是什么地位，你就永远是什么地位；最后一百零八人聚义，不过是对这种既定秩序的确认，没做任何调整。

这样僵化的人才机制之所以暂时没出毛病，不是什么义气的约束，而是生存压力太大，官军三天两头来围剿，打仗还来不及，没工夫窝里斗，也形不成这样的氛围。几百年来的人物评论者注意到，像林冲、鲁智深、武松这些人，为什么单干的时候一个个光彩照人，而一上梁山就都蔫了。

我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一个僵化的机制里失去了进取精神，也就是说利益驱动不足。也许林冲火并王伦时还这么想想，但他很快发现，自己被永远挂在以晁盖为核心的七人生辰纲集团的权力边缘，认命了。

当然也有例外，李逵和花荣等人还是比较积极的。李逵基本上是个二百五，只要有酒有肉领导再跟你拍拍肩膀，就指哪儿打哪儿，不必细表。花荣是个聪明人，他之所以比较活跃，在于正式排名虽在秦明之后，但由于是秦明的大舅子，非正式排名往往都在秦明之前，就这么一点小小的伸缩空间，已足以让一个聪明人死卖力气。可见梁山泊好汉的内部空间实在可怜。

也有不满足于这种僵化机制的，主要来自水军头领。李俊后来领着一帮人闯南洋去了，咱也再弄个国王当当。

早在梁山泊时期，张横就想出头，那是关胜来剿的时候，由于宋江主力在外，张横一朝权在手，就要去偷营劫寨，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。我想施耐庵写这一段时应该挺为难，要是写张横打赢了立下大功，再往后就不好安排了。

所以，宋江永远是头领，吴用永远是军师，秦明永远是先锋，时迁永远只能干登高放火的勾当，鼓励的是人人各安其位，谁也不要非分之想。

如果梁山泊是个企业，这个企业一定完蛋。

□ 责任编辑 于岸青

群贤毕至

案头一部书，翻阅半年有余依然不舍收起，每每目光触及，珍爱之情油然而生，这书便是李方膺所修《乐安县志》。

李方膺，何许人也？

若知扬州八怪，必定亦知李方膺。作为“八怪”之一的李方膺文采出众，散文和诗词造诣颇深，更以画而名天下。

李方膺1697年生于南通州一个书香世家，1728年雍正皇帝更新吏治，李方膺以“贤良方正”受到举荐。先后担任山东乐安知县、莒州知州、兰山知县、安徽潜山知县、合肥知县，1751年从合肥知县位归隐，此后与一些著名文人结为挚友，诗画为伴度日月，1755年病卒于南通州。

李方膺生性正直、豁达，作品也如其人，用笔纵横跌宕，用墨酣畅淋漓，雄浑、恢弘之气喷薄于纸上。李方膺善画松、竹、梅、兰和草虫，尤以画梅见长，间作山水、人物，尽显豪放苍劲，水墨淋漓，风格独特。画梅以瘦硬见称，老干新枝，欹侧蟠曲。传世作品有《梅兰菊松图册》、《秋菊图》、《墨梅卷》、《双勾竹石图》、《苍松怪石图》、《盆兰图》、《风竹》等。郑板桥对李方膺的画艺极为佩服，他在李方膺逝世五年后所作的《题李方膺画梅长卷》中称颂李方膺画梅为天下先。“日则凝视，夜则构思，身忘于衣，口忘于味，然后领梅之神、达梅之性，挹梅之韵，吐梅之情，梅亦俯首就范，人其剪裁划划之中而不能出。”“思来通州，得睹此卷，精神焕发，兴致淋漓。此卷新枝古干，夹杂飞舞，令人莫得寻其起落，吾欲坐卧其下，作十日功课而后去耳。”

愿借天风吹得远

□ 李业陶

畅，李方膺自题诗曰“波涛云海几飘蓬”，便是其为官多年的真实写照。他先是在乐安私自开官仓赈灾被弹劾，又于兰山任内反对新任总督王文俊垦荒令，抵制勒索乡民，上书直陈弊端，触怒上司，被投入监，冤狱三年。李方膺自知县起始为官二十余年，未得升迁重用，反而屡屡遭受打击迫害，最后在合肥知县任上时适逢饥荒，李方膺自订救灾措施，且不肯“孝敬”上司，被太守加之莫须有的“贪赃枉法”罪名而罢官，晚年常常卖画以资衣食。

李方膺1735年被冤入狱后，兰山、莒州一带农民成群结队带着鸡黍米酒前往青州监狱探视，狱吏不许他们见李方膺，老百姓就把带来的钱物、食品往监狱的高墙里扔，留下的酒坛子堵住了监狱的大门和甬道，以这样的形式表达对李方膺的拥戴和同情，宣泄对官府行为的不满。

由于亲感实受官场黑暗和百姓疾苦，李方膺把自己的爱与恨融入笔端，“自笑一身浑是胆，挥毫依旧爱狂风”，表达不屈服于腐败朝政的坚强意志；“愿借天风吹得远，家家门巷尽成春”，寄托对劳苦大众的关怀和同情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正是这种爱憎鲜明的情感，为李方膺的诗画作品注入灵魂、升华境界，从而成为传世艺术珍品。

李方膺人品如梅，洁身自守、不畏邪邪，官德也堪称后人楷模，以亲民、勤政闻名，获得百姓爱戴。

1730年夏秋之际乐安大水成灾，万家漂槽，情势紧迫，李方膺未得上司批准，开仓赈济，下令动用库存存粮1200石，以工代赈，募民筑堤，缓解了灾情。1732年李方膺赴莒州任职，时为雍正八年洪水淹莒后两年，又加雍正九年蝗虫为祸，州内哀鸿遍野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人口稀少，李方膺上书皇帝，慨然陈词，奏报灾情，恳求赦免钱粮，获得恩准，特旨减免莒州钱粮。

次年莒州再次蒙受冰雹风暴之灾，灾荒益重，民生不安，李方膺不顾官场迭次报灾的禁忌和同僚劝阻，再次为民请命，终于又讨取了“分别灾情地域，酌减田赋”的旨意。同时，他还张贴文告，招抚流民，动员农民生产自救，因此，莒州百姓生活状况大有好转。在莒州期间，他深入调查，深以战乱、天灾致典籍散失为憾，认为莒地“而数千百年以来，圣贤所居，豪杰崛起，忠孝节义，以及文人才士，炳炳烺烺，多可纪者。若缺而不修，非所以彰往事，示将来也。”因此，他在续修乐安志后，又题修莒志，历经一年成稿。

李方膺为官清正，不善逢迎，自然官运不



李方膺